



武汉会战研究

陈富安 刘光明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序

韩文卿

《武汉会战研究》出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半个世纪以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起来，组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大军，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战略要地武汉对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战役。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它的“速战速决”和北攻（进攻苏联）、南进（夺取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战争计划遭受严重挫折。为了摆脱不利局面，日本侵略军把攻占武汉作为它的重要战略目标，调集了14个师团，约占其侵华军队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分两路直逼武汉。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国民政府采取了积极保卫武汉的方针。蒋介石亲任总指挥，委李宗仁、陈诚分

别负责江北、江南防务，调集14个集团军，129个师、110余万人，部署在武汉外围，决心抵御日本侵略者。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冯玉祥、张群、白崇禧、孔祥熙、陈立夫等也来到武汉，参与谋划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期间，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高潮时期。为了积极配合武汉会战，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派驻了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组成的代表团，设立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与国民党共商救国大计。同时，派出大批党的干部到武汉，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动员一切民众的力量保卫武汉。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八路军129师和115师各一部出击平汉路南段，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新四军挺进江南，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伏击日军汽车队，破坏宁沪铁路、宁芜铁路及宁杭公路等，打得敌人疲于奔命，日夜不得安宁。在华北和华中广大的敌后战场，进一步开展了游击战争。这些都有效地削弱了日军进攻武汉的军事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历时近五个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打死打伤日军20多万人，击毁击伤日舰船百余艘，飞机百余架。虽然此次会战最后以武汉失守而告结束，但是，由于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在战斗中消耗了敌军大批有生力量，遏止了日军战略进攻的势头。随着战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日军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泥潭之中。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

为了科学地总结武汉会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1988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联合召开了“纪念武汉会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武汉会战研究》就是

由陈富安、刘光明二位同志将会上交流的论文经过精选修改后编辑而成的。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武汉会战的历史背景、各主要战场和国共两党的主要贡献、失败的原因及其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这本书的公开出版，对于弘扬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有积极作用。

武汉会战已过去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国防力量大为增强，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更加提高。特别是今年我们赢得了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社会主义中国更加坚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奴役和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的中国，已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共两党的有效合作，在历史上取得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事实说明，“合则两利、分则两损”。现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需要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放弃“三不”政策，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1990年10月

紀念武漢會戰

著揚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革命精神

一九九九年十月 王首道



紀念武漢會
戰推進祖國和
平統一

郭述申

一九八九年十月四日

目 录

- 序..... 韩文卿 (1)
- 武汉会战评析..... 皮明麻 (1)
- 浅谈武汉会战的历史背景..... 杨小毅 (25)
- 武汉会战是国共合作抗敌御侮的高峰..... 鲁永成 (32)
- 武汉会战及其历史意义..... 赖文楼 (39)
- 武汉会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杜中原、缪经中 (50)
- 浅析武汉会战的基本特点..... 周玉承 (57)
- 试析武汉会战..... 孙正国 (63)
- 武汉保卫战及其取得的成绩..... 陈隐若 (74)
- 江南战场瑞昌以西的防御战..... 曹仕力 (81)
- 武汉会战的大冶战场..... 石功彬 (92)
- 浅谈万家岭大捷中的口袋战术..... 郭盛碧 (100)
- 武汉会战对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作用..... 黄明治 章海 (110)
- 试析武汉保卫战持久坚持的原因..... 陈富安 (122)
- 试论武汉保卫战国民党军失利的的原因..... 刘跃光 (130)
- 武汉撤退真相述论..... 教文尉 (138)
- 试论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和贡献..... 沈 骏 (147)
- 试论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会战中的作用..... 段纪明 (153)
- 中国共产党与武汉抗战期间的抗日救亡运动..... 曹清儒 (159)
- 中共长江局与武汉抗战..... 夏 钢 (167)
- 浅谈武汉会战与石首党的建设及其抗日活动..... 王祖荫 (182)
- 武汉保卫战对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刘春林 (191)
- 中间党派在武汉抗战中的重要贡献..... 刘光明 (199)
- 武汉保卫战中的郭沫若..... 徐美文 (214)

武汉会战前夕的一束奇葩·····	阮湘华	(221)
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与武汉抗战·····	李明秀	(231)
谈谈中苏空军与武汉空战·····	曾运新	(245)
中国空军与武汉保卫战·····	宋健	(254)
论武汉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的特点·····	谈方 孙少衡	(264)
武汉会战期间史沫特莱的生活片断·····	李自忠	(271)
武汉抗战时期的进步与逆流·····	朱虹	(280)
日寇对武汉的法西斯统治及其暴行·····	徐美文	(288)
武汉抗战时期大事记·····	颂威 整理	(296)
国民党军与日军战斗序列·····	东安辑	(329)
后记·····		(335)

武汉会战评析

皮明麻

不息前行的时间把五十年前的武汉会战已经推得相当遥远了，但是身历目染这一战役的武汉和周边腹地的人民，却不能忘怀这悲壮雄伟的一页。翻阅来自大陆和台湾的那些白发皓首的国民党抗日将士所写的回忆录，展读中国共产党在当年创建的《新华日报》和新四军老战士的纪念文章，一种超时空的力量将我们带进了半个世纪前的历史烽烟之中。年轻人也许对这一页历史是陌生的，但史学工作者的笔触应能穿云破雾，把这一页历史写清楚，不要让它在研究不充分的状态下消逝。

一、国共合作与武汉会战的口号

武汉会战发生在1938年6月至10月间。谈到这次会战，人们不无疑虑地联想到“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国民党提出的，当年使用和接受这个口号是否正确，现在是否要绕开这个口号。应该说，解放后的许多现代史文著中，都作了这样的规避。要弄清这件事，还是要让我们先展示一张简赅的时间表，并相应地讨论一下国共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的政治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和军队，在西安事变后，逐步实行了政策转变，明确了抗日立场，在正面战场进行抗战。

但存在妥协的倾向。

1937年秋，日军挫败“八·一三”抗战，占领上海，1937年11月13日占领南京，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政府机关先到武汉，武汉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陪都。当时，日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受英美支持的蒋介石也把工作转移到抗战轨道上来，国民政府抗日态度日趋积极。蒋介石来到武汉指挥军事，并在武汉大学（当时该校已迁往四川乐山）举办了军官训练团。但这时，汪精卫已谋求与日本妥协，蒋介石也作妥协的试探，并企图通过德国的斡旋乞和，但没有成功。

作为抗战决心的一种表现，蒋介石处决和处分了一些畏敌如虎的败将。

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开封召开第一、五战区团以上军官会议，蒋介石斥责部分高级将领为保存实力望风退却，并令将在津浦线上后撤、放弃山东重镇济宁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陆军上将韩复榘拿办。当时，蒋介石因南京失陷退到武汉，准备入川。韩复榘与四川军阀刘湘勾结，密谋由刘湘封锁入川之路，韩复榘则从南阳、襄樊、汉中撤退，与宋哲元部联合倒蒋。蒋觉察这一阴谋后，以在开封召集军官会议为名，决定捕韩，押解武汉。1月19日，武汉行营宣布韩的罪状为不遵长官命令，擅自撤退，强迫鲁西人民购买鸦片，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1月24日，判处死刑，即行枪决^①。

差不多同时，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公布了43个抗战不力将领判决名单，其中判死刑8人，其它处分35人。主要有：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因指挥失当，记大过一次；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贻误战机，放弃守土，处死刑；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作战不力，解职留任。

^① 《新华日报》1938年1月25日。

蒋介石这些严厉措施，既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溃败的反映，也体现了国民党政府初期的积极抗战姿态，当然也暴露了蒋介石集团内部矛盾，达到了蒋介石消除异己的目的。

紧接着，为了确立抗战的政略和战略，国民党举行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原定在1937年10月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决定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李宗仁、冯玉祥、陈果夫、孔祥熙等1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出席和列席者353人。

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提议》和其它电文，要求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各党派爱国人士参加政府。

这次大会确定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并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纲领”中，确定抗战与建国相并举的方针。“纲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六个方面的政策：外交方面提出“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军事方面规定“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和“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政治方面表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加强完成地方自治条件”；经济方面提出“鼓励海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和“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等；在民众运动方面表示“发动全国民众”，“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以及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等等。

在“宣言”中，指出“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号召“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但同时又强调全国抗日力量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实行“政治的统一”，要各党派作“政治的休战”。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抗战初期的全面政治纲领，标志着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政治上的进步和政策上的转变，对当时抗战形势表现了适应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种进步思想是有限度的，“纲领”中没有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妥协的主张，也没有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有抗日党派参加的政府、释放政治犯等。至于允许集会结社等许诺，也往往是一纸空文。

在大会之后，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条例》，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外重要政策方针，应提交参政会决议。7月5日，毛泽东、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陈绍禹等7名共产党参政员发表了《我们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提出动员各方面力量保卫大武汉，改革征兵制度，改善人民生活，普遍发动群众，保障人民权利。7月7日，毛泽东致电参政会，提出：“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首次会议在武汉举行。会议10天，出席的有各党派、各团体代表136人，还有政府各院部官员、来宾、中外记者1000人列席会议。议长汪精卫致开幕词，蒋介石在会上讲话。大会收到了125件提案。中共代表和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诸如，“正式确定抗日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严令禁止各党部及各级政府压抵民众救亡运动”、“根本改革现行保甲制度、”、“明令减除苛捐杂税，减少高额地租，取消高利贷”等，但受到国民党的阻挠，而汪精卫派的参政员则提出“加强德意外交”等反动提案。会上，内政部长何键、外交部长王宠惠、财政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交通部长张嘉璈、经济部长翁文灏、政治部长陈诚分别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最后通过了《拥护国民党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等。会议在“宣言”中号召各党派“舍小异

而趋大同”，“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而长期抗战”。会议决定在参政会闭会期间，设驻会委员会，并选出张君勱、左舜生、沈均儒、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等25人为驻会委员。

参政会成立于抗日气氛高炽之时，体现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抗日立场，也表现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一定程度地开放了民主。在武汉举行的首次参政会，尽管政见纷陈，但抗日救亡的方向成为会议主流。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形势下，中共湘鄂赣省委和坚持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都遵照党中央指示，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于1937年9月由延安抵武汉，参加了谈判工作，并筹组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同志，指导重建在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0月，在汉口安仁里1号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处长李涛。12月，南京梅园新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分批入武汉，并入武汉“八办”。1938年元旦，“八办”迁入旧日租界中街89号原大石洋行（现长春街57号），由钱之光任处长，下设副官、总务、文书、会计、运输、警卫、机要、招待所等部门。原在南京的八路军代表叶剑英以及李克农、廖承志等负责同志亦到达武汉。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成立中共长江中央局。当月中旬，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陈绍禹等抵汉，在“八办”内设立长江局机关，对外一律以“八办”名义进行工作。长江局由陈绍禹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兼统战、军事部长，委员有董必武（群工部长）、凯丰（宣传部长）、李克农（秘书长）、叶剑英、项英（兼东南分局书记）。长江局的任务是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还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及其它党派进行统战工作。同月，新四军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委。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红二十八军改编为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部，改编时掀起扩军高潮，吸收二千多人入伍。长江两岸游击队组成新四军第四支队。

在“八办”附近的大和街，设有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和招待所，项英、叶挺在此办过公。1937年元月下旬，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军部。该办事处工作由“八办”代为办理。

“八办”是我党在国统区领导抗日斗争的机构，在这里实施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路线。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广泛地在军界、政界、文化界和工人、学生中做了大量工作。“八办”的公开工作是每月向国民政府领取八路军军饷、军械、被服等，经火车运往西安“八办”，再转运山西八路军总部和延安，同时收转国际友好人士、华侨捐献给八路军和解放区的款项，接待各党各派各团体人士及进步青年以及国际友人、爱国华侨，帮助他们到延安、山西、竹沟、七里坪、汤池、皖南等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工作。在“八办”的接待室，周恩来等同志会见过许多来访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许多同志就是在这里转介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革命根据地。仅1938年5—8月，通过“八办”输送到延安的青年即达800多人。

“八办”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军、政界及各党派、各团体和广大工、农、青年学生进行联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抗日，对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来的抗日积极性给予支持，对其妥协倾向进行有节制的斗争。

为了制造革命舆论，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党在汉口创办了《新华日报》（1938.1.11—1938.11.25）和《群众》周刊。根据党中央关于“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区”的指示，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和湖北省委还部署举办了河南鸡公山干部训练班、湖北应城汤池合作事业训练班。陶铸同志（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宣传部长）则亲自负责汤池训练班的工作，与民主人士李范一合作，先后培训了400多人，为革命根据地和 new 四军五师培养了一大批骨干。

“八办”和董必武同志还大力营救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的革命同志。当时“反省院”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把党员和积极分子名单暗中送到了“八办”和董必武处。董必武在1937年11月间，在湖北反省院监狱中救出任卓民、华岗等六名难友，不久当湖北反省院裁撤时，又救出120余人。在秘密工作中，不少失掉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也经过“八办”和董必武同志的联系，恢复了关系。湘、粤、桂、滇、川、赣、皖、苏、浙等省中共组织的负责人，都曾来到武汉“八办”，向长江局请示工作。

当时，苏联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抗战。苏联派出的军事顾问、苏联的航空志愿队和大批飞行员，先后到达武汉。加拿大著名医生、国际主义者白求恩从国外到达武汉，于1938年春到延安。印度孟买学院附属医院大夫柯棣华于1938年9月30日率医疗队到达武汉，后又冲破国民党的阻拦，到达延安。斯诺（美国）、斯特朗（美国）、史沫特莱（美国）、路易·艾黎（新西兰）、伊文斯（荷兰）等，都在中共代表和“八办”的接待、介绍下，或从敌后到武汉，或从武汉进入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斯诺在1938年春夏与路易·艾黎在武汉成立工业合作促进会，建立战时合作社，组织难民自救，支持游击战争。并在菲律宾及南洋华侨中募集到100余万元捐款。史沫特莱在武汉组织“国际慰问团”，带着两卡车药物到山西慰问八路军。

以上事实表明，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是比较和谐的。这种合作的主导原则是共同抗日。当时压倒一切的最高政治任务是挽救民族的危亡，将日本侵略者逐出中国。武汉会战正是在这种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氛围中展开的。

始终在政治上站在抗日战争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以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抗战路线、政策发挥着政治领导作用，八路军、新四军在战争中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抗日的主力军，由于武汉会战处于正面战场，国民党在国统区中处于执政地位，并掌

握军事上的指挥权，因此国民党就成为正面战场的组织者和决策者。武汉会战中“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国民党提出的。

由于国民党在抗日初期的基本倾向是积极抗日，其“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不过是这一口号的表现而已，因此，具有积极意义，对当时动员群众投入武汉保卫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口号是不会被遗忘的。此其一。

“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也包含了武汉会战的宏阔规模，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当时的武汉会战，是以武汉为中心，以鄂、皖、豫、赣为广阔战场的大战役，而不是武汉一城之攻守战。故一个“大”字，颇见概括力。此其二。

同时，这一口号虽为国民党所提出，但共产党亦积极接受和支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就说：“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问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①我党在武汉创办的《新华日报》，在创刊后的第三天（1月13日），就发表《怎样保卫大武汉》的社论，并刊登了中共领导人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关于“保卫大武汉”的文章，指出：“从六月开始，保卫大武汉成为了舆论的中心内容。”^②党在湖北、武汉的地方组织事实上也在运用这一口号动员群众。陈少敏在1942年所发表的文章中，还多次提到“保卫大武汉”。如说：“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湖北、豫南的救亡运动，象雨后春笋地在各地开展起来”，“为了组织广大群众，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中共湖北省委从七里坪移到汉口，领导湖北的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地参加到各种动员工作中去”，又说：“董必武、郭述申、郑位三同志为保卫大武汉及时地动员全湖北及豫南的党员，积极动员群众准备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③

① 《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4年版第502页。

② 《新华日报史》（上册），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③ 《七七日报》1942年第六期。

当然，由于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和妥协倾向，使他们在组织、发动群众投入保卫大武汉的实际工作中，受到了种种局限。在这方面，国共两党不能不发生矛盾，我们党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二、武汉会战

1. 日军“长江跃进”战略和中国“保卫大武汉”计划。

武汉会战的战线之长、时间之久、兵员之多、规模之大、牺牲之重，是抗日战争中其它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之东沿，居长江、汉水之交，又为平汉、粤汉铁路的衔接点，是我国的心脏腹地和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后，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也成为中日两方攻守的中心目标。

日本侵略军自芦沟桥事变后扬言：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但在中国军民的奋勇抗击下，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到1937年底，抵达中国的日军已愈16个师团，占其陆军总兵力的2/3。这使日军统帅部深感行将陷入长期消耗的泥沼，严重地影响了北进（苏联）和南下（夺取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计划。为摆脱这种局面，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武汉，控制中原，就可以支配中国。日本昭和研究会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中指出，“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广东（州）以及其它抗战中枢”。他们尤其重视汉口，认为“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日军统帅部的攻占武汉的意图是“将蒋政权逐出中原，压迫到边陲地区，以取得战略、政略的有利态势”。^① 这样使蒋政权“逃往内地”，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②

^{①②} 《大本营陆军部》，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424页。